

税负水平高不高，看数据不如看“疗效”

□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



E-mail: cdsbjmjl@sina.com

前期“我国上半年宏观税负达到44%”余波未平，又有声音表示，我国人均宏观税负高达6338元。不过却有权威媒体报道认为，44%的测算只是半年数据，存在计算方法上的问题。专家称，就“科学测算”而言，目前的宏观税负仅为35%，在国际上“处于中等水平”。

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。要正确判断，一要问有多高，二要问计算科不科学。问题就在于，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，可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计算标准。

给出44%这个数据的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，宏观税负一般包括4项内容：公共财政预算、政府性基金、社会保险基金，以及国有经营性资产收入。4项加起来，2014年上半年基本占到了GDP的44%。但是反方辩友却认为，这个数据“不科学”，因为政府收入的四大块之间是存在交叉重复的，比如：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包括了财政补助款

入；同时半年数据可能会导致分子变大，分母变小，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税负水平。

但是，35%的数据就准确和科学么？的确，社保基金有重复计算之嫌，但要知道，列入的国有经营性资产收入数据不过500亿元。在2013年，国企的利润达到2.4万亿元，其央企利润达到1.3万亿元。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，利润并不完全来自竞争，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其他企业和公众财富的挤压效应。另外，庞大的政府债务，需要用未来的税收来偿还，本质上也是一种宏观税负。至于很多预算外运行的非税收入，如乱收费和乱罚款，则是一笔糊涂账。

也就是说，宏观税负的口径可宽可窄，再加上不够透明，要证明税负水平高和不高，都很容易，按需取材就是了。相关讨论难逃沦为了一场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的口水仗。

中国税负水平高不高，看数据不如看“疗效”。所谓疗效，一方面固然是指税负水平要和纳税人的福利水平相一致——毕竟纳税人交税就是为了购买公共服务；另一方面还指税负水平要有利于经济发展。前者是税负的去向，后者是税负的来源。

道理很简单，税负不是无源之水，需要经济发展提供活水源泉。调节税负的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和

经济结构调整。即便把税负作为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目标，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功能。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，就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税率，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。税率太高，投资者被吓跑，经济活动不发生，反而收不上税来。因此，不能只考虑短期利益竭泽而渔，而更要考虑长远利益放水养鱼。

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。严峻的现实是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税负过重，已经成为供给方的巨大压力；而纳税人的税负过重，则成为消费需求不振的沉重包袱。这就要求实实在在地降低税负，不做宏观税负不高的数据游戏。

职业资格证书泛滥缘于行政权越位

□李迎春 成都

日前，国务院14个部门负责人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。有委员提出，目前职业资格许可领域，一个行业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职业资格。有关方面借机敛财，通过办班、教材、考试收取高额培训费。一些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堆证书就是找不到工作。人社部负责人回答说，本月国务院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、注册税务师等1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，到明年将基本完成取消职业资格证书许可事项工作，“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类职业资格，一律取消”。

诚然，“考证热”持续很多年了。这个东西，除对少部分借此敛财的人有益外，对大部分人而言，实在是劳民伤财折腾。考证能检验一个人的考试能力，却不一定能反映其实际能力。用证书证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资格，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，这种游戏按道理是玩不了多久的。现实中，很多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早不把所谓的资格证当回事，但它之所以玩了这么久，与有关方面的坚持和滥权有直接关系。

人社部负责人的表态推敲起来很值得琢磨。它取消的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些不合适的限制，而是取消“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准入职业资格”，言外之意是当下很多职业资格许可本身就无法可依，用严格的法律术语讲，无法律依据就意味着非法。

职业资格许可是在设置职业准入门槛，其本质是一种权利限制。从依法行政的角度看，行政部门要做这样的限制，必须要有法律依据，否则就不能限制。而现

实中，却存在着大量没有依据的限制，说明在这一领域，一些部门的权力僭越相当普遍。

事实上，非法限制根本不存在取消的问题，因为它本来就不应存在。如果是非法的却又普遍存在，那么就应该强制取缔。你说取消，反倒间接承认了它们的“合法性”，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一些行政部门有不法设置职业资格许可的权力。但无疑是需要高度警惕的。

非法设置职业资格许可的是行政权，取消许可的也是行政权。行政权完成了自我纠错，但问题是，这种纠错可靠吗？如果不纠正怎么办？

事实表明，行政权可以非法设置职业资格许可，并让它长期存在，同样也可以取消它。而行政相对人基本上都是逆来顺受。比如一个毕业生，要进入某单位，必须要有某个资格证。他可能知道这个职业准入限制非法，但几乎没人因此拿起法律武器维权。不是他不愿抗争，而是抗争的胜算实在太小，得不偿失。但如果人们遇到这种限制后，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法律诉讼推翻这种非法侵害，相信行政权力的僭越一定会少很多。

所以，行政权自我纠错只是解决问题的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让当事人能真正通过法律对僭越说不，并获得司法救济。权力自觉靠不住，需要法治之下的有效监督和制衡。如果我们只停留于行政权自我纠错的层面，并盲目点赞，那么类似的权力僭越不会减少——迫于压力，一些僭越可能会被取消，但缘于行政权内在的自我膨胀和逐利冲动，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非法限制。

“车考腐败”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

□盛翔 湖南职员

车管所不放过40所驾校，从学员信息录入、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，关卡“雁过拔毛”，所长受贿近300万元，临时工也不落空，贪污30万元……一本小小的机动车驾照，背后竟牵出令人瞠目的腐败，河北省石家庄市车管所第三分所20余人“沦陷”其中。如何防范“车考腐败”重演，强化监督成为关键。

驾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，“车考腐败”因此也是世上最危险最致命的腐败。用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话说，考生通过给考官塞钱获得驾照而不是凭驾驶技术拿驾照，童话都不敢这么写！可惜，童话里不敢写的，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。传说中的“车考腐败”，

大概要算最广为人知的腐败之一。去年，广东湛江车管所全所42名驾驶证主考官全部涉案，其中39名警官合计上缴贿金2100多万元。这次，石家庄车管所第三分所几乎也是全员“沦陷”。为什么“车考腐败”都是窝案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监管稀缺。

王岐山说“要瞪大眼睛发现问题，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对妇孺皆知的“车考腐败”来说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是，“车考腐败”已然已成“马路杀手”的“摇篮”。驾考是检验学员驾驶水平、交规掌握和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，如果考官为了个人利益不负责任，放出来的是“马路杀手”，受害的则是不特定人群。换言之，“车考腐败”其实就是以危险

方法危害公共安全。对这样危害巨大的腐败，理当监管尤其严格、惩处尤其严厉。“马路杀手”上路闯祸，应该严肃追究考官的连带责任。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明确规定，对3年以下驾龄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的，倒查考试发证民警的责任。但实际上却没有考官被因此追责的案例。

要严治“车考腐败”，就必须让纸上的法规走入现实，同时要求交警部门公开交通事故相关信息，包括驾驶员姓名、培训驾校、教练员姓名、考官姓名，以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。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不仅驾驶人要受罚，驾校也可能得退出驾培市场，考官可能也会被追究责任，惟其如此，驾考发证才不至于腐败得那么无所顾忌。

不要对受骗大学生进行“二次伤害”

□杨朝清 武汉高校教师

开学在即，正当同学们高高兴兴准备迎接新学期时，重庆医科大学的大四学生小文(化名)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一万多元学费，不到一小时就被路边残棋摊骗走，让小文陷入痛苦之中。

一位大四学生竟被并不高明的街头骗局所蒙蔽，既遭遇了物质上的经济损失，也承受了精神上的挫败感和失落感。正所谓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”，在骗子们欲擒故纵、虚与委蛇、金蝉脱壳的精湛演技和利益合谋面前，缺乏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不幸成为受害者。

街头的残棋对弈，表面上是技术较量，本质上却是一场赌博和诈骗。人性中的贪婪、好胜，让涉世未深的小伙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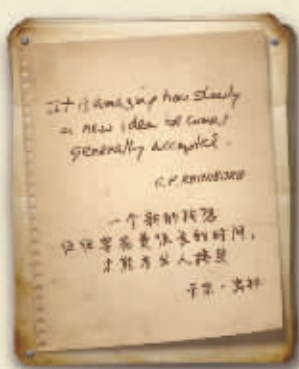
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残棋博弈之中，一步步越陷越深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街头骗局并不少见，受害者也不少。只不过，在眼球效应时代，一旦主人公被贴上“大学生”的身份标签，再加上“被骗光学费”的悲苦叙事，成为舆论焦点也就在所难免。

在这起街头诈骗案中，小文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。只玩三局就输掉了父母辛辛苦苦为他挣来的学费，其内心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。然而，面对这位受骗大学生，汹汹舆论，要么情绪化地指责他“太傻了”“太幼稚”，要么简单地将此事归咎于大学防骗教育缺失，甚至有人建议要给大学生开设防骗课程。这样的情形，很可能对受骗大学生造成“二次伤害”，让大学生群体“躺着中枪”。

大学教育不是万能的“创可贴”，不能大学生出现某个方面的问题就开设某个方面的课程。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中，包括防骗教育在内的安全教育并不是没有，而且还很重要；可惜的是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一些大学生对风险社会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警惕，直到上当受骗才追悔莫及。

英国教育家亨利·纽曼曾如此阐释大学教育的应有之意：“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和公众的智力修养，纯洁国民情趣”。下棋原本是一个生活情趣，一旦裹挟了太多功利和算计，就可能迷失方向。更进一步说，人必须为自己的疏忽和过错承担代价；尽管一万元的“学费”有些残酷，但如果小文能从中吸取教训，也未尝不能坏事变好事。

回归本源 · 80 载品质承诺



1915-1927
达尔·宏邦在中国上海通过观察中国人饮食和健康状况，萌发了革命性营养理念——研制营养补充品来平衡饮食。

1934
研成公司第一款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食品，纽崔莱的前身——加利福尼亚州纽崔莱公司由此诞生。

1939
公司名称为纽崔莱产品公司，纽崔莱品牌在美国推出。

1945
在自有土地上开始有机种植实践，尝试自产高品质的原料。

1948
纽崔莱“倍立健” Double X 诞生，公司一举成名。

1998
纽崔莱进入中国，推出纽崔莱“蛋白盾”、“倍立健”成为保健品市场领导品牌。

2005
在中国推出纽崔莱“倍立健”片，迅速成为保健品市场领导品牌。

2006
启动合作农场的卓越农场标准，九人原则确保认证农场的原料高品质。

2013
纽崔莱第一款结合中国传统养生及现代营养理念的产品——双喜片上市。继2000、2004、2012年赞助中国奥运会后，纽崔莱成为2013-2020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营养保健食品。

2014
纽崔莱成立八十周年。安利(中国)植物研发中心之中国无锡落成。纽崔莱进军体重管理领域。



纽崔莱“倍立健”片 内含维生素G6004019 适宜人群：免疫力低下者，中老年人。
纽崔莱“蛋白盾” 内含维生素G600390130 适宜人群：免疫力低下者，亚健康者，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。
纽崔莱“双喜片” 内含维生素G620120670 适宜人群：需减压、放松者，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哺乳期。纽崔莱“双喜片”不能代替药物。 纽崔莱“蛋白盾”片 内含维生素G60018120668号

安利(中国)日用品有限公司
广东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39号中德广场41楼
安利(中国)服务热线: 4006-688-888

纽崔莱 NUTRILITE